

19 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

李小桃

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伊万诺夫-拉茹姆尼克对 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战果进行过清点,他总结道:对俄国知识分子来说,19 世纪是一个战斗的世纪。“这一史诗般的世纪之战使俄国的知识分子拥有了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这场战争锤炼了俄国知识分子,就如同火焰炼铸了钢铁。”

在世界诸多语言中,“知识分子”一词采用的多为 *intelligentsia*——即俄语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的译音。而俄语的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并非俄人原创,而是来自拉丁语的“*intellegentia*”。它之所以采用俄语音译的方法进入世界语境,这是 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活动和影响所造就:19 世纪的俄国优秀知识分子代表把崇尚道德伦理,富有怜悯心、人道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对社会生活激烈批判、具有强烈的济世救民的责任感这一内涵深深烙进了知识分子概念中。他们鲜明的个性、独有的气质、积极的活动,为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intelligentsia* 一词的“诞生”提供了语境,随后,它便以俄化的形式,带着它在俄所获得的意义进入西方的各种语言之中,被用来表示之前已经存在的“受教育的阶级”、“有教养阶层”和“自由职业者”所不能充分表达的语义成分。

俄国知识分子也以其多样化的面貌、对道德的极度重视、对人民强烈的崇尚和责任感而载入史册,树立了一个典范、一个极好的参照物。

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被誉为知识分子脊梁的利哈乔夫院士认为:“第一批真正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出现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苏马罗科夫、克尼亚日宁、诺维科夫、拉季谢夫、卡拉姆津。”(《俄罗斯知识分子究竟诞生于何时?》对这个问题中俄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参阅李小桃:《也谈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发轫》,《俄罗斯研究》,2009, No.4, 第 11—20 页)。

19 世纪时,俄国知识分子已形成三种类型:学者型、社会实践家、批评家和思想家型。

学者型知识分子

学者型中最引人瞩目的首推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作为一个有着学者头脑的诗人,罗蒙诺索夫首次在俄罗斯文化历史上将“文学”阐释为理性的思想工具和武器而并非单纯是为了消遣娱乐。为了把社会引入理性的方向,他不遗余力:一边在科学院里忙碌,一边大量地翻译和写作,同时还积极投身社会工作,莫斯科大学就是在他的呼吁和策划下开办的。

除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外,罗蒙诺索夫也认定自己有责任帮助政府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他通过颂诗进谏,故他的称赞带有一点教喻的成分,以让政府做并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知识分

子,罗蒙诺索夫的诸多思想在后来的专家治国论者、科学救国的知识分子中不断得到再现。

以文学和出版为舞台的社会实践家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把发展教育视为改良社会的捷径。他对俄出版业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在 18 世纪最后 25 年的出版物中,其中的三分之一(约上千种)是在他的印刷厂里印刷的。他出版的图书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同时,他还主办了三种讽刺性杂志,并亲自执笔为杂志撰写针砭时弊的文章。他还在 16 个城市开书店,在莫斯科设立了图书馆和数所学校,把赚得的钱财投到教育和慈善上以回馈社会。

从后来诸多的办实业、投身教育等社会事业的俄国知识分子身上,我们不难发现诺维科夫的身影。

俄国知识分子的特征

俄国知识分子在世界知识分子之林中,以鲜明的个性引人注目。这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也是俄社会历史发展之路的特殊性和俄文化独具的特质所致。他们的卓尔不群集中体现在——

道德至上

“道德、道德评价以及道德动机,在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俄国理论家费多托夫把这种道德因素称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性,把它视为以思想-理想-真理-真和真理-公正的融合为前提条

(下转 12 版) ➡

➡ (上接 10 版)

宙”)诞生于混沌之中。

从我们课题的视角出发,由上述一类多领域学科得出的论点尤为重要(系统论、控制论、协同学):

第一,在某个系统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特殊时期——过渡期,这时的系统要经历不稳定状态、无组织状态,进入一个混沌状态或与之类似的状态。这种过渡期的长短可能各不相同,但是通常比稳定发展期要短一些;

第二,这种过渡期一结束,系统或者被毁(这时替代它的是另一个系统),或者进入一个新状态;

第三,无论是过渡期,还是其结果,绝非取决于任何因素:不仅是过渡期的产生和持续,还是过渡期的结果(也就是新状态),都是在偶然性的作用下得以实现,或者确切地说,诸多因素之间偶然的相互作用(在协同学中是指“吸引子”)。因此,根据这一观点,过渡期之前的那个状态,既不能决定过渡期是否会来临,也

不能决定过渡期的结果是什么。换言之,过去不能决定将来,即,过去并不包括任何“前提”和原因,来决定过渡期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状态;

第四,新的状态根本就不一定会比过去的状态“更高级”、“更完善”:它的变体区间可以有无限之大,可能的变化轨迹极为广泛。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关于过渡期的理解,与传统观念非此即彼必择其一。传统观念在阐释全新状态如何产生时,通常带着“飞跃”、“革命”、“前提”、“原因”等诸如此类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正是传统阐释所特有的。当然,很多因素的偶然性相互作用也可以称之为“原因”,但是,这显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原因。此外,现代观念假定,一个系统对于新轨迹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前面的路径如何:系统的运行取决于它们的前时期。

上述规则对于俄罗斯文明史是否适用这一问题,其答案显然取决于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的解答:通过自然-数学类学

科得出的概念和方法,是否适用于社会-人文学科。诚然,无论是系统论,还是控制论,亦或是协同学,它们都是在总结自然现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首先是通过研究物理、化学等系统的研究总结出来的。因此,其概念和方法对于社会人文系列的学科是否适用这一问题,迄今仍有争议。

根据我们的观点,这些概念和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人文方面的认知过程,只是带有一系列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的共同原因在于,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实,其中包括人本身,以及人的意识、精神生活、意志、感情、情绪。在所有物体中,人并非是一般的物体:他/她的生命和尊严是具有长远意义的价值的。也正是因此,不能“设计”和制作混沌,并为此辩解,在混沌之后会有一个新的、更为“完善的”、“公正的”状态来临。要知道社会的混沌状态,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大量人员的灭亡,会导致经济的衰退和其他破坏正常生活的问题。此外,如前文所言,过渡期根本远非总能导

致某种更为高级的状态产生,因此,愿望中的“公正”社会很有可能不会来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不完善的、更加不公正的社会。

如果回顾过去,回顾历史,尤其是回顾俄罗斯历史,那么,在俄罗斯历史长河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一系列过渡期,这些过渡期完全符合有关过渡期的现代观念——大量的混沌元素,无组织、不明朗、不可预测,也就是可以称之为“混乱时期”的现象。同样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混沌中的秩序”的诞生过程——逐渐恢复秩序,社会生活逐渐正常化,随后就是发展、现代化。

应该看到,文明历史上过渡期的重要特征在于,在混沌时期之后,历史后续发展轨迹不是那样自由,不是那样偶然,如同在自然过程中一般。也正是在文明史上,系统“选择”新的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之前的道路:系统的运行取决于它们的前时期。因此,文明通常会恢复自己的基本结构。原因在于,在文明这个庞大的社会系统中,其基

本结构相当稳固,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固定不变。因此,从混沌转向有序,通常会按照一定的模型、模式、模子进行,而在我们的理论中,也就是会按照一定的文化-基因密码进行。

文化-基因密码也就是文明的记忆,这个“记忆”既用于一般理解,又用于系统论意义。但是,记忆的可靠程度可大可小,在很多情况下也有可能完全失忆。在后一种情况下,会出现社会失忆现象,这种社会失忆有可能是自发性的,也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过渡期或者以文明的反自然变形而告终,或者以其物理意义上的消亡而告终。为了不让这种悲剧发生,社会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记忆,应该珍藏并保护这种记忆。如果记忆能被保存,那么,文明总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一种力量,走出混乱时期并得以恢复,向时代的新挑战给予应有的答案。

(译者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